



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站上世界文化的高峰

文/袁江洋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关键词】 社会文化,科学革命,历史变革,世界文化,民族心境

DOI:10.3969/j.issn.1000-3045.2012.01.012

文化(culture)的核心是价值信念系统,而社会制度、习俗以及物质文化成果则是这一价值系统的外在表现。文化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近义词,哲学家斯宾格勒将文化视为处于上升之中的文明,并将文明视为步入暮年的文化。历史学家汤因比相信,不同种类的多元文明是探讨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基本单元,人类文明的发展或进步取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和互渗。从这样一种文化动力学来检视人类历史,能够为我们思考今日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提供良多教益。

在此,让我们解析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这就是现代科学产生与人类社会现代化启动之谜。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产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三大运动首先使欧洲发生文化转型,即由前现代形式转入现代形式的文化发展轨道。这种变化在随后的300年中逐步波及全球文化的每个角落:美国发生这种变化始于18世纪,日本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维新,中国始于20世纪初,而非洲则晚至20

世纪中期即二战结束以后。

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发生于16、17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而非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譬如中国或印度,为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看到的是,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仅仅只是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变革,那么,科学革命则是一场全球性的历史变革,无论是就其对全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还是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言,均是如此。

在理解科学革命时,仅仅看到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忽视其他人类文化的作用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无疑需要相当强的智力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一方面,如果人类智力的发展不达到一定的高度,科学革命便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的产生还需要有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科学的制度化发展便不可能开启。无疑,能够将人类智力关注的方向有效地引向自然的文化是有助于科学制度化的开启的,形成崇尚科学的文化氛围对科学的制度化是有利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须得承认,容纳了古犹太教一神论思想和古希腊-罗马哲学理性的基督教文化,的确在其自

*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E-mail:yjy@ihns.ac.cn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2年1月3日

身的文化框架之内为古代自然哲学的发育和成长留下了空间,在此框架之内确实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将人类智力源源不断地引向自然。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基督教文化,就有了现代科学;并不是说,科学革命的发生,仅仅是欧洲文化的内部事件。

若按汤因比的思路,从长时段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互动的历史视角来思考,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可能的结论。

其一,如果说在科学革命发生之前的2000年中,世界文化确实成其为一个系统、成其为一个整体,那么世界文化交流互动的中心地带恰恰位于地中海沿岸。蒙古的西征,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十字军的东征,伊斯兰大军的西征,所有这些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宗教传播活动促使地中海沿岸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所,这是世界历史铸就的世界文化冲突与互渗的核心地带。2000多年以来,世界文明在这里汇聚:古犹太教的一神论信念与古希腊-罗马泛神论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并化合为新的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古希腊文化关于在自然之中寻找自然现象之因的哲学理性、关于世界本源的持续追问、关于天体运动的数理解析模型以及它基于逻辑和经验的推理模式,通过古罗马文化、通过中世纪后期的考古发掘、更重要的是通过阿拉伯文化的发展和转呈,在基督教文化以神学为核心的神学-自然神学-自然哲学知识体系中重新生根;来自中国文明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也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此,为基督教文化宗教改革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所以,科学革命也只能在这里爆发并导致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化的产生。

科学革命铸就了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学科体系,也铸就以科学传统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文化。按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见解,科学革命以及新生的科学文化为人类

文化注入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由此,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均不得不告别它旧有的传统而走上现代化之路。水晶天球的崩坏,不只是意味着基督教传统世界图景的崩溃,也意味着依附于这种世界图景之上的基督教神学价值观的解体。由此,自由和理性、民主和科学成为主导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价值。

其二,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能够缔造科学革命和现代文化。我们知道,在遥远的东方,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它不但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中心-边缘式的帝国文化结构,而且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但是从世界文化互动的总体结构来看,汉字文化圈仍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亚文化中心,远远谈不上是世界文化交流与互渗的核心。所以这里并不具备爆发科学革命的智力基础和社会条件。

事实上,自17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开始派遣宗教使团来华传教,但由于东西方深层文化理念之间存在着剧烈冲突,满清政府最终选择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甚至杜撰出自欺欺人的西学中源说来维护文化自信。19世纪后期,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巨炮的压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历经无数苦难、压迫和屈辱,也由此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常常令国人憾腕的是,日、中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差距只有短短的30年,但这30年的差距就足以让日本这个长期以来在汉字文化圈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以前的文化母国。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却是明治维新之成功与戊戌变法之败。戊戌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摇摇欲坠的家天下统治,而且发生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情形下,既缺乏充足的变革人才,也缺乏拥有坚强意志和权力的领导层,不免归于失败。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则表明,日本文化的每一次飞跃均来自主动的文化开放和



中国科学院

互动,遣隋使、遣唐使的使船为日本载回先进的中华文化和制度;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兰学已有上百年的发展过程,维新初启,半个政府的留学活动则不但为之带回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带回了西方的文化制度。

所有这些例子无不表明,文化的强盛取决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乃至碰撞和冲突;一个民族,若不能站立在世界文化交流与互渗的制高点上,就不可能走向真正而持久的强盛和繁荣。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程,终而使得中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也使当代中国人开始拥有一份特别强烈的文化自决与自尊之心。正因为有过百年的屈辱,这种文化自决和自尊之心才是那样的深挚、那样的充满活力。然而,文化强国之路却不在于宣扬和复兴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文化,不在于将“孔子学院”办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甚至不单单在于发展文化产业,而在于能否站立到世界文化的高峰之上,以真正开放的心态拥抱包括本民族

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2008 年欧洲金融风暴来临之际,我国投入了 4 万亿巨资来应付可能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且持续购入大量美国国债以帮助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但是,与其买美国等国的国债,一个更有价值的行动是以十万、百万人的规模大量派出中国的“遣美使”、“遣欧使”、“遣日使”,这才是文化强国的捷径。文化发展系百年之计,而百年之计在于树人。派遣 100 万的知识“掠夺者”(培根用语),可能需要花费 1.5 万亿元(以 10 年派遣 100 万博士留学生计),但却不仅可以帮助刺激留学目的国的经济,还能极大地提高中国“所罗门宫”里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当时中国全时当量 R&D 人员约为 180 万人)!

在民族节日里,如果我们要将孔子、孟子等人的雕像竖立于天安门的东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须将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雕像竖立于天安门的西端。只有在这样的民族心境中,我们才会拥有本民族的培根、牛顿和康德。

(接 88 页)

或政治目标而发展科学,最终都不可能使科学得到正常的发展。功利主义科学观还严重低估了科学本身的价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导致科学精神在中国长期不振。坦率地说,中国科技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并不符合国人的期待。但这也毋庸苛责。今天我们应当以更平和从容的心态,审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不只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此必须从基础上加以精心培植。其中,科技体制建设尤为关键。八九十年前,蔡元培、丁文江等先贤创建我国的国家科学院时,十分重视制度建设,视之为“百年大计”。与科技有关的制度是近代科学发展以来逐步形成的,不是中国所固有的。民国 20 多年,我们仿效西

方初步建立了现代大学和科研体制。解放后,我们改弦更张,试图摸索一种新的体制以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但却走了很长的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体制的改革相对迟缓,严重制约着科技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吸收科技先进国家的科技制度文化,引导科技界尊重科学传统和科学规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科学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是人类心智的荣耀,必须尊重科学本身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学术自主、激励学术创新、防止学术腐败、杜绝对科学的滥用,才会拥有更健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这是中国科学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